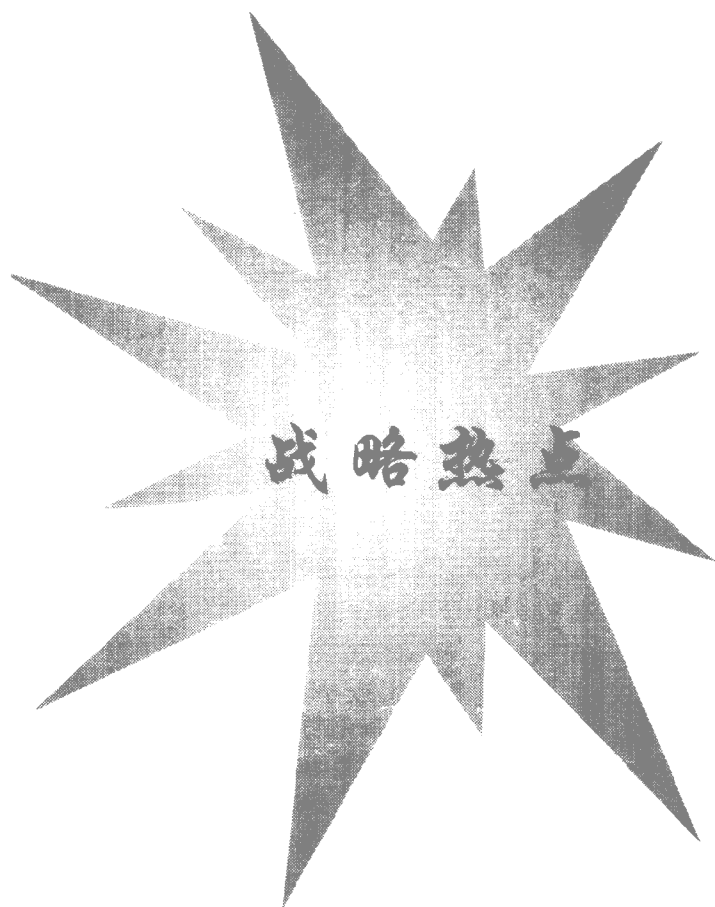




增长问题要纳入中长期战略的视野

1996年，中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十五年远景目标规划提出。由于当时对增长速度问题的估计较为乐观，这一中长期战略强调，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关键之一。现在看来，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增长动力问题并未完全解决。1998年政府提出要确保增长8%。这个政策目标的意义实际上远超出短期宏观调控的范围，已关系到国民经济在跨世纪发展过程中能否继续保持高涨、繁荣局面和宏观长期向好。

一、增长动力不足的隐患已经潜在

从1981年至1996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其中1993~199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在此期间，中国政策调控的目标主要是抑制过热，经济扩张的增长动力似乎总是自然存在的。这一认识以及当时“21世纪亚洲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乐观估计，掩盖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大量积累的诸多矛盾和不利因素。

在从80年代初期以来的“翻两番”战略发展过程中，中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主要支持因素是以下若干方面。一是在农村经济关系调整推动下产量一度大幅提高的农业和在“六优先”政策支持下大发展的轻纺工业。“六五”期间，是轻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走出了“第二次大调整”的谷底，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1981年的4.4%提高到1985

年的 12.8%。二是在对“瓶颈”产业政策扶持下迅速扩张的基础原材料工业中国的钢产量从 1980 年的 3712 万吨提高到 1997 年的 10757 万吨，17 年间实际产量增长了 190%。三是受惠于“七五”期间贯彻实施的“梯度发展战略”和其他改革措施发展起来的“特区经济”与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其中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 1986 年至 1993 年间每年增长速度达 25%~30%。四是从“七五”开始“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到 1990 年底时，中国乡镇企业个数达到 1850.40 万个，企业总产值占全社会总产值比重达到 22.27%，固定资产原值达到 2202 亿元。五是“八五”期间外向型经济的快速拉动。1995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 40.33%，当年贸易顺差达 166.9 亿美元，“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为“七五”同指标的 3.48 倍。六是伴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几乎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家电产业。中国目前的冰箱、洗衣机、彩电生产能力和实际产量已均居世界第一位。但到“九五”初期，上述增长支持因素，由于已经过不断挖掘潜力，对新的增长过程的支持能力或则已相继弱化甚至消退，或则需要调整与再积蓄力量。从深层次说，已经潜在增长动力不足的隐患。

“九五”并非对新的增长支持因素没有安排。但在 1996 和 1997 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除“软着陆”的短期宏观调控外，汽车与房地产等新支柱产业成长、规模经济与集中化、股市大规模扩容、通过“破产兼并”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债务负担等战略措施大多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此时，远比短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的缺陷更为深刻的增长危机已经在深层次形成。

1997 年年中，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与此同时，各种内外矛盾的积累正在使中国原有战略的许多内在缺陷集中地暴露出来。1998 年，中国国民经济面临的是国际环境、外贸、引进外资、

支柱产业、乡镇企业、特区经济、消费市场等几乎所有增长支持因素的前景均不乐观的增长形势。显然，我们需要讨论的已不仅仅是 1998 年能否确保 8%，而是国民经济能否避免走向衰退，实现长期繁荣、稳定。

二、中长期发展关键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当前，一些专家已将增长问题纳入了中长期战略研究的视野，目前的探索主要集中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能否突破“20 年连续高速增长极限”的国际经验；二是在中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良性波动期间是否应控制在 7%~12%；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是否已出现了从“通货膨胀拉动”转变为“通货紧缩压抑”，是否已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人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短期政策来实现中长期战略目标。

实现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的增长，关键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即人们常说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支持中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何在？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知识经济是动力，大力开拓新兴第三产业是动力，继续推进外向型经济扩张是动力。但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判断，根本的动力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1. 新一轮生产手段的彻底改造。工业化过程，最根本的发展任务是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对经济增长的最根本推动力量是生产手段的彻底改造。应当大声呼吁，中国还远没有走完生产手段改造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1998 年抗洪抢险的电视画面可以清楚地说明我们才在手工劳动基础上走出了多远；中国吨钢综合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0.2~0.3 吨，1 亿吨钢多耗的能源要占到中国能源总消耗量的 2%，占到钢铁工业能源总消耗量的 20% 左右，这个事实显示出与钢铁大国和钢铁强国的距离还有多大。在

“翻两番”战略中，由于资金与成本限制，中国许多产业发展较多地采取了倚重初级技术、适用技术的技术构成选择，主要表现为大量引进二手设备、接替发达国家淘汰产业、“三来一补”推动下的劳动密集型组装业发展等。当前，一方面这种低度化的技术构成已明显成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21 世纪谁来武装中国”的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借鉴“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应当注意到，从根本上带动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出“过剩危机”的是产业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可以说，在中国重要基础产业实施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战略正当其时。

2. 竞争主导下的资源优化配置。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本质含义，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关系调整；另一方面是依据效率、效益对资源实行优化配置。资源优化配置是竞争的结果。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主要产生于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结构调整和区域间分工关系重组；二是利用规模经济过程中的集中化；三是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多种所有制发展过程中国民财富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

3. 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整治。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地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生产领域的效益提高已极大地依赖于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善。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外部性”的低效率不仅使追加投入的边际效益急剧下降，而且也严重抵消了企业内部设备与管理改进的作用，使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也不断趋于下降。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整治是一个包括交通与通讯条件改善、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灾害防避等多方面内容的广义范围。可以预期，基础设施大规模整治过程将不仅是巨大投资需求的产生过程，而且将是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社会分工关系不断优化重

的过程。

4. 消费结构良性化过程中的需求拉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与“翻两番”发展过程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供求关系的常态已经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流通与消费领域。1998年，当经济为“过剩”所困扰，增长受到需求不足的抑制时，刺激消费成为了政策的主要指向之一。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消费结构不合理。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在于改革滞后。前期的改革过程较多地侧重于调整人们与生产资料结合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例如“多劳多得”、“承包”、“劳动合同制”、“竞争择业与下岗”、“按要素分配”等；但对生活福利范围内的体制关系则几乎未深入涉及，例如迄今福利分房制度仍未真正终止。从长远看，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点不在于降息以使人们觉得储蓄无利可图，不在于鼓励人们购买更多的食品、衣物，甚至也不在于空调或VCD等新型家用电器是否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而在于人们在传统的以衣、食为主的消费支出之外，把原有体制下一般非个人承担的行、住、医疗、教育、养老、家庭意外风险防范等方面支出纳入个人的消费构成。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人们对体制性福利的期望逐步降低直至消除，消费结构良性化过程中产生的需求拉动将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量之一。

1998年11月

可持续发展 挑战与危机

一、没有比人类的共同前途与命运更为重要的了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跨入新世纪过程中面临的共同课题。从 90 年代初起，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的中长期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1994 年 3 月，《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被提交国务院第 16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这份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 1992 年通过的《21 世纪议程》相呼应、正式代表中国政府态度的重要文件庄重指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致每一个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深知自己在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和可以发挥的作用”。还有比人类的共同前途与命运更重要的事情吗？没有。可以说，这份文件已经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作出了最高的概括。

“九五”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规划中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安排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土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出要“依法保护并合理开发土地、水、森林、草原、矿产和海洋，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机制，加强土地管理”。二是环境和生态保护，提出要“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所

有建设项目都要有环境保护的规划和要求；搞好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创造条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健全环境保护的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环境的质量有所改善”。

请注意“九五”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有两个特点，一是力图通过利用市场机制的方法改善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状况，二是在中期范围内把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首先放在城市建设和工业污染治理上。实践发展证明，这一战略设想的认识存在重大缺陷。

二、原有战略对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估计不足

“九五”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最重要的缺陷在于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迫切性明显估计不充分。1997年的黄河超长期断流、1998年全国性的特大洪灾以及渤海赤潮等环境变异清楚地警示人们，用“刻不容缓”、“迫在眉睫”来形容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已经毫不为过。深刻的教训已经使实施战略调整、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性不容质疑。在这种形势下，单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设想显然已不能满足紧迫需要，依靠行政性、法律性强制手段的黄河上中游用水限期缩减50%、森林资源“全面禁伐”、对环境有明显破坏作用的资源采掘实施“禁采”等措施陆续出台。重要江河整治、水土保持等成为了从最高决策层到边远落后地区贫困人群共同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出现了从重要江河的下游地区向上、中游地区推移的趋势。在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中，出现了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甚至脱贫、“奔小康”战略都要更多地让位于环境的趋势。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是不是我们对1997年到1998年的自然变异反应过度？不是。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

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比任何国家都要尖锐。认识我国可持续发展形势的严峻性、紧迫性，有必要特别强调两个特殊性。一是历史。如果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始端于工业文明的出现，那么在我国，人类活动对可持续性发展条件的破坏早在农业文明推进过程中就已经大规模开始。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超过土地承载力的人口繁衍造成了几千年来对土地、对环境的反复过度索取，造成了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造成了对长江中下游众多河流、湖泊水系的不断围垦，造成了长江中上游地区人口超高密度聚集和林木资源不断消失，造成了西北地区沙化侵袭的普遍存在。可以说，我们要还的环境“债”可迁延上溯的时间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长得多。二是现实。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一般保持同步。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建国后的前 30 余年，工业生产力主要向少数超大型城市聚集；改革开放以来的近 20 年，大量乡村工业遍地开花。城市化进程缓慢和城市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使我国克服工业文明负面影响的难度要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大得多。大城市工业治理、中小城市工业治理、分布极广的乡村工业治理，我们面临的重点是难度最大的两头。正是由于上述特殊性，如果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中不能对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作出充分认识，那么在 21 世纪，环境代价将可能以几何级数的速率迅速扩大到我们无法承受的地步。

三、要从广义范围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九五”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规划设想，到 2000 年，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环境的质量有所改善”。现在看来，这一目标涵盖的范围远不充分。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协

调。我国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至少包括四大层面，即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治污问题。

工业文明最大的负面作用是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科学家已经证明，1998 年中国长江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全球性的“厄尔尼诺”现象不断严重密切相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哲学与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把“生产力”明确定义为“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发展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与改造正在不断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全世界的人们都开始认识到“地球只有一个”，破坏自然过程、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必然是毁灭人类自身。

《中国 21 世纪议程》指出，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不仅需要有“禁伐”、“禁猎”、“禁采”等具体措施，而且应当在新的中长期战略中明确写入一个根本性的认识：人类与自然界的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且和谐相处的关系。

我国的经济正发展处于高资源指向性的工业化阶段。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比我国格外尖锐。一方面，欧美的一些老牌发达国家依靠掠夺殖民地度过了工业化阶段，日本等后起的发达国家依靠 60 年代廉价的国际石油度过了工业化阶段，而我国解决资源难题的最大指望只能是技术进步和加快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源禀赋产东丰饶，而且资源的品位不高。我国的一次能源中 70 % 以上只能靠低热值，高运输成本和高污染的煤；我国的水能资源大都蕴藏于开采、利用成本极高的西部与西南地区。一方面，我们必须获取大量的资源支持才能完成工业化，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实施对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战略。一个不容继续回避的问题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当对资源出路作出

正面回答。

与资源难题紧密相连的是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处于关键地位。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努力，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到 1997 年底，我国人口总数为 12.36 亿人；当年的人口出生率为 16.57‰，自然增长率为 10.06‰；从 1987 年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 10 年保持了下降趋势。但即或如此，我们仍不能对人口与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矛盾的缓解有丝毫乐观。有一组根据联合国《统计月报》、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年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推算而来的数字可以给我们一定的提示。1996 年末的世界人口为 57.68 亿人，同年美国为 2.67 亿人，我国为 12.24 亿人。1996 年世界总发电量为 129548 亿度，世界人均占有 2245.98 度；美国发电量为 33453 亿度，人均占有 12529.21 度；而我国发电量为 10813 亿度，人均占有 883.42 度；如果我国人均占有的发电量达到当年世界平均水平，需要 27490.80 亿度，这个数字为当年世界总发电量的 21.22%；如果我国人均占有的发电量达到当年美国的水平，需要 153357.43 亿度，这个数字为当年世界总发电量的 1.18 倍。1996 年世界汽车总产量为 5133 万辆，世界人均占有 0.0089 辆；美国汽车产量为 1179 万辆，人均占有 0.0442 辆；而我国汽车产量为 147.52 万辆，人均 0.0012 辆；如果我国人均汽车产量达到当年世界平均水平，需要 1089.36 万辆，这个数字为我国当年汽车产量的 7.39 倍；如果我国人均汽车产量达到当年美国的水平，需要年产汽车 5410 万辆，这个数字比当年世界汽车总产量还要高出 277 万辆！列举这一组数字是想说明，我国的中长期战略不仅应当对我国即有人口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性、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而且要在赶超型结构的设计中作出符合现实资源可能性的安排。

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治污问题要强调三个调整。一是不仅要着眼于城市，还要着眼于广大乡村和河流综合治理；二是不仅要着眼于微观的技术性治理，还要着眼于结构性的整体治理；三是不仅要着眼于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还要着眼于环境建设。

四、环保产业应当成为战略发展过程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8 年，与确保国民经济增长 8% 的宏观调控目标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措施相结合，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一个新认识是环境建设、环保产业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因素。

环保产业成为战略发展过程中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与环境治理具有密切关系的城市改造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必将带动投资需求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增长。二是与污染治理相结合的资源回收处理与再利用、环保设备的制造等将带动新的产业发展，促进结构升级。三是环保技术是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最重要的领域，环境科学将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基本推动力量之一。

1998 年 12 月

要认识国民经济运行风险的长期性

1998 年，亚洲以至世界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的风云变幻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防范与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任何经济决策最重要的出发点。

应当说，在“九五”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规划制定之后，我们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是有所警惕，并采取了很多防范与规避对策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出现的必然性、长期性都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当前指望在短期内“严防死守”解决风险防范问题的认识仍相当普遍。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并非是一时、偶发的现象。我们有必要从基本理论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来论述经济运行风险产生与存在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一、风险来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发展

分工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一方面，广泛分工意味着社会经济系统被分解和组合为一个不断延伸的再生产链条，这个链条上任一环节的断裂都可能造成整个社会再生产系统的中断；另一方面，分工发展使任一个别生产环节的外部依赖性和在投入与产出两端面临的不确定性都不断增大，从而风险增大。在原有计划体制下，由于各个社会再生产环节在投入与产出两端面临的不确定性很小，分工导致的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往往为人们所

忽略。但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这种风险已经确确实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近年来，由于对市场变化估计不足造成决策失误、以致许多重大项目投资无法收回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可以说，当前我国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在强调企业要独立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社会化的风险分散系统发展严重滞后。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的技术风险之外还被迫承担起了本不该完全由它们独立承担的投资回报风险、资金周转风险、流通过程风险和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动风险等。实际上，当社会化的风险分散系统严重缺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风险被强制分解到一个个经济个体独立承担时，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风险程度不仅不能有效缩小，反而会更加增大。在规避风险问题上我们需要有长期性、规范性的战略措施。

二、风险来自商品二重性矛盾的外化与激烈对抗

撇开自然性因素引起的风险不说，任何社会性因素导致的风险发生，背后必定有某种社会经济矛盾趋于激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下的任何社会经济矛盾都是商品二重性矛盾的外化与对抗形式。商品二重性矛盾的第一步外化就使个别经济活动与市场对接过程具有了风险。当信贷关系产生，使用价值与价值运动在时间上产生分离，内在的商品二重性矛盾外化与对抗程度进一步加大，经济活动过程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大。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新现象、新矛盾以至新的风险并未走出基本理论所足以概括的范围。泡沫成份、金融危机是什么？不过是价值运动完全脱离使用价值运动过程而成为一种独立运动过程导致的产物，不过是商品二重性这一内在矛盾高度外化与激烈对抗的产物。任何企业资产的使用价值或重置价格能够如股市那样瞬息万变吗？显然不可能。任何房地产等物业的实际有用性或建造成本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大起大落吗？显然不可能。当资本本身

成为一种“资本化”的商品，成为股市、债市、汇市、期市以至种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对象时，这些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已经与使用价值完全无关，只要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主观预期向好，市场需求几乎可以假定为无限大。泡沫与风险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神秘，对左右金融、资本市场力量的任何“拜物教”观念都是错误的。国际投机资本所作的不过是在世界性资本过剩和信息技术与金融系统发展使资本集中的可能性大为提高的背景下，使市场固有的风险以极度夸张的形式显现出来而已。我们要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矛盾的高度外化与趋于对抗就不可避免，风险累积与释放就不可避免。从中长期战略发展的角度看，我们要做的并非是预测国际投机资本能否袭来，而是从完善政策体系、规范市场过程、改善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设置起有效的风险制衡体系。

三、风险来自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一般规律

当我们探索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有两个现象值得思考。一是我国重要基础产业中大中型企业对银行的巨额不良债务，二是韩国大型工业企业集团中不良资产的大量累积。人们通常把前一现象归结为“贷改投”等改革措施的不完善，把后一现象归咎于韩国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和韩国金融系统的内在缺陷。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更深层次看，上述现象的出现与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一般规律密切相关。在工业化阶段，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和竞争不断加剧，重要基础产业唯有不断把利润，以至超过利润的信贷资金追加到新一轮再生产过程中去，才能保持利润率不下降。就是说，重要基础产业发展过程存在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或说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趋势。但当基础产业走过上升阶段，市场趋于饱和时，这些产

业的利润率通常会迅速下降到利息率以下。这时，扩大再生产投入中的信贷资金部分很容易沉淀为不良债务。这一工业化进程中的固有风险已经为各国的工业化史所反复证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在工业化阶段涌现过“钢铁大王”、“石油大王”或“巨人”企业，但在跨过工业化阶段后，这些基础产业的大型资本集团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衰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不能假定中国的厂长、经理或韩国的资本家会在预期收益低于银行利息率的条件下决策进行技术改造或生产扩张。事实上，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流传甚广的“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的说法并非仅仅是对体制性缺陷的揭示，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反映的正是对这一基础产业发展过程固有规律的直观认识。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一定要对这一风险有足够的估计。根据国际经验，除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决策科学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改革投融资体制等措施外，规避这一风险的关键，在于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一定要有协助资本从衰退产业解脱出来的产业退出政策。

四、风险来自个人金融资产不断增大条件下的社会经济预期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风险不仅来自客观因素，而且来自主观因素，来自社会公众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亚洲金融危机并非仅仅源于经济系统的内在缺陷，社会公众的信心动摇对局势恶化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信心危机对国民经济构成威胁的物质基础是个人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大。在原有计划体制下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个人金融资产很少，人们表达对未来经济前景悲观看法的唯一经济性方式是有限的抢购。这不难用配给制的方式解决。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私人外汇存款、国债和股市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一旦出现公众性的信心动摇，分散决策下的个人金融行为已经足以